

# “80后”的职业群体差异

田 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80后”青年已经从学校进入社会,获得了相应的职业地位。通过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处于不同职业地位的“80后”青年在收入、消费、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方面的状况和差异,可以发现,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能够作为一个区分和衡量“80后”青年社会结构所处位置的有效指标。同时,还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影响很大,社会变迁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高社会流动率阶段。

**关键词:**“80后”;职业群体;社会分层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3)01-0088-11

流行在“80后”青年中有一条这样的短信:“读小学时,大学不要钱;读大学时,小学不要钱。还没工作时,工作是分配的;可以工作时,得自谋职业。”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却深刻地反映出“80后”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教育和职业的变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研究主题能够像职业分层一样成为社会结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自从奥古斯都·孔德创立社会学这门学科和马克思勾画出社会经济关系的剥削本质以来,在以往社会经济资源分布研究中,职业分层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就目前国内外学界使用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大部分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沿袭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传统和习惯。无论是涂尔干、马克思,还是韦伯、帕森斯,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职业分层在经验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往往是科学研究的难点,职业的概念比其他社会分层指标的概念更容易界定,职业变量在社会调查等操作化过程中更容易清晰表达和测量。故而,大部分经验研究使用的研究框架所描述的内容是与职业相关的,也就是以职业

分层为基础的,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是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观点。

本文试图从职业分层的角度分析“80后”群体内部职业差异,利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来验证职业分层与其他形式社会分层之间的联系。经过严格的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663个。

## 一、文献回顾

社会分层从根本上说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人与人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比如财富、地位、声望、权利等等<sup>[1]</sup>,其理论溯源主要是来自马克思和韦伯两位社会学大师。社会分层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核心内容,却在他的著作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把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按照生产关系区分为两个对立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并将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视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马克思那里,人们所从属的阶级完全是由个体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且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阶级意识与阶级一样,也是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派生物。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决定阶级属性,这一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构架的缩写。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单纯依靠生产关系来确定阶级属性的总体性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韦伯提出的多维社会分层指标更能够适应社会多样性的需求。韦伯将决定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主要因素分为:

收稿日期:2012-11-12

作者简介:田丰(1979—),男,安徽蚌埠人,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社会分层、社会调查方法及人口社会学研究。

财富、声望和权利,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单单是财富所决定的,阶级划分只能体现出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而除了生产关系之外,人们社会地位还受到声望的影响,由此,韦伯在马克思提出的客观的生产关系之外给出了主观性的测量指标。围绕主观的声望指标,Blau 和 Duncan 以职业声望为基础,形成了一套测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方法,随后演绎出多种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分层方法<sup>[2]</sup>。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分层方法实际上是将职业、收入、教育等诸多相关性很强的指标关联在一起。由于职业与收入、职业与教育、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职业、收入、教育往往被纳入到相关的或者统一的指标体系中。声望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很难深入地了解一个个体的情况,声望很多时候成为一个总体性的群体性概念相关联,成为与职业、收入和教育相关联的附属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社会制度弱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职业结构性变化(城镇人口就业结构的后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工业化)的三重影响,这些影响的综合作用造成不同人群在劳动力市场内就业机会和职业区隔的不平等,所以分析“80 后”青年人群需要考虑他们不同的起点条件和机会际遇各异,特别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教育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都影响到不同“80 后”群体的利益分配,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强化“80 后”群体制度性差异的作用,导致“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红二代”、“穷二代”等说法层出不穷。Blau 和 Duncan 认为,尽管社会出身确实有某种影响,但教育背景和培训以及早期的工作经历对成功机遇的影响更加深刻。事实上,这些“二代”在“80 后”群体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并不可能成为左右社会分层的关键人群。故此,本研究所延续的仍然是社会制度弱化、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就业结构产业化三重影响的综合作用下,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思路。

从理论上说,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是确立社会分工体系的前提,也是现代社会中职业体系形成的条件之一,更是工业化社会分层逻辑的重要基础。关于中国是否形成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至今还有争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或者职业区隔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职业的区隔主要依靠文凭、培训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方式来形成<sup>[3][4]</sup>,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则是赤裸裸的社会制度因素,即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认为中国没有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包括:(1)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用人体制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内尚有残留;

(2)不同身份的劳动力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差异显著;(3)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整体影响尚未完全消除<sup>[5][6][7]</sup>。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尚不能称之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支持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 2 亿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在工商业企业中就业,显然是劳动力市场化作用的结果;二是非公有制单位在使用劳动力时,不是在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用人体系,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市场化雇佣制度<sup>[8][9]</sup>。此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教育回报率的升高,远比计划经济时期接近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劳动力价格与人力资本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sup>[9]</sup>。Szelenyi 通过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市场化转型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 1977—1985 年处于地方市场发展的阶段,1986 年步入混合经济阶段;1996 年后由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出现,与其他转型经济一起同步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意味着计划经济“铁饭碗”的用人制度被打破,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开始<sup>[10]</sup>。本文倾向于认同 Szelenyi 的观点,即虽然户口等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其影响已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自由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或者可以认为是带有较弱社会制度束缚下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除了社会制度对“80 后”青年职业产生影响之外,还有改变“80 后”就业和职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在社会流动的经验研究中被称作结构性流动,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掌握某些特殊技能的人群能够出现普遍的流动趋势,比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以及计算机出现对职业分类的影响。这同样意味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或者阶层在生产过程,即支配人们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制和途径发生了变化,典型的产业结构、高等教育和职业岗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变化。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扮演的更多是与户籍制度一样的区隔社会的角色。在计划经济时期,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大专和中专,都会伴随着相应的身份和户籍的改变,尤其是对农业户口的青年而言,考上大学、大专和中专,不仅仅意味着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还意味着身份从农民转变为国家干部,户籍从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只有在实现身份和户籍上的转变之后,一个

农业户口青年才有可能在城镇地区实现就业。高等教育制度实现社会区隔的方法就是通过上学这一门槛,将优秀的农村青年转化为城市青年,从而在不断吸纳农村优秀青年的同时,保持对其他农业户口人口的区隔,将农业户口青年转化为一个“育苗区”,保持了对农业户口的压倒性优势,阻碍社会合理流动。高等教育快速普及的同时,市场竞争机制也淘汰了一些本来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却无力支付学费的收入较低人口,而高等教育不再与职业和就业挂钩,也使得教育回报的稳定性减弱,接受高等教育却没有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青年也不容易找到一份良好回报的职业。李春玲和杨舸、王广州的研究都证明,尽管高等教育在普及,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并没有消除,尤其是在城乡年轻人之间,非农业户口人口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sup>[11][12]</sup>。所以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之下,不仅仅减少的是农村户口“80后”青年人群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降低了他们的期望或者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努力方向,他们不再带着鲤鱼跳龙门的梦想,寒窗苦读,而是尽早地进入职业发展领域,或者说尽早地成为农民工。尽管中国社会文化中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依然响彻在耳边,但非农业户口人群和农业户口人群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异实实在在地被拉大了,从而使不再重视教育的农业户口人群在经济社会结构性转变过程中,再一次沦为弱势群体。

本文试图从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社会流动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制度、高等教育、就业产业结构方面因素,分析发现:社会制度形成的就业区隔在公有制单位和企业内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户籍制度和单位性质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公有制单位和公有制企业中,农业户口的“80后”青年受到明显的排挤。而非公有制单位中就业则更多的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呈现出一种自由竞争和优化配置的关系。此外,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性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对“80后”青年职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较高收入的职业必须以较高水平的教育为基础。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80后”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取向上出现了显著的结构差异,高等教育的普及非但没有成为让城乡“80后”青年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反而使他们之间出现结构性的机会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也起到了以市场化手段来形成职业区隔的作用。所以,“80后”青年社会分层应该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以职业为核心的分层逻辑,但必须要考虑到社会制度影响。

## 二、“80后”青年的职业群体划分

如果在社会中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被先赋因素所决定,比如:家庭背景和个人出身可以赋予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特权,或者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那么通常可以认为其社会流动性较差。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名二代”等可以被视为由于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决定的特殊阶层家庭子女。反之,如果在社会中,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被自致因素所决定,比如职业、文凭、技能等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身份和资格等,那么通常可以认为其社会流动性较好。西方社会从低社会流动率过渡到高社会流动率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实现的,中国则不太一样,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总体性框架设计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工业化社会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故此,必须要对“80后”青年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加以分析,并探讨社会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以此作为分析“80后”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首先,将“80后”群体分化的基础分为三个层面:(1)基于个体职业,(2)基于家庭资源,(3)基于社会制度。其中,第一个因素——职业是在整个“80后”群体分析的核心。以第二个要素——家庭资源划分的“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名二代”,由于在定量分析中,他们就数量而言仍然是极少数人,在常规的社会调查中很难大面积地捕获到足够的分析样本,很难将其纳入进来。在本文分析过程中,将这部分青年与在组织上占有优势的管理者和在知识技术上占有优势的专业技术人员合并,视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在资源上占有优势的青年职业群体。第三个要素——实际上在职业划分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户籍制度和性质的区隔效应较为显著。

根据以职业为核心的分析思路,本文将国家干部、企业主、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视为第一类职业群体,因为他们的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相对较高,且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本和文化技术资本上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第二类是办事人员,他们虽然不具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本和文化技术资本,但多从事非体力或者非一线生产性工作;第三类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自营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较为模糊的就业位置;第四类是城市工人,他们从事的是一线生产劳动或者服务,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第五类是与城市工人一样从事一线生产劳动或者服务的农民工,区别在于他们是农业户口;第六类是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为农

业户口的劳动者。从分类结果的规模来看,农民工、农民和城市工人是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考虑到调查虽然在设计时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但在各个子群体的分析中,其样本的权重和代表性可能存有一定问题,所以,调查样本中各个职业群体分布和现实社会中各个职业群体的分布不能等同而论。因此,本文对“80后”群体的职业群体划分考虑了社会制度弱化、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就业结构产业化三重影响,但需要对相关的特殊人群进行调整。从分类结果的层级来看,可以笼统地将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归为中等阶层;而第五类和第六类归为下等阶层。

根据调整后的结果,表1还比较了不同职业群体中农业户口、公有制单位和受教育年限。从比较结果来看,在包括国家干部、企业主、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第一层级中,农业户口的比例仅为29.4%,公有制单位的比例也是29.4%,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4.8年。这一层级中并没有将户口性质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农业户口的

“80后”青年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办事人员层级中,有40.6%的是农业户口,在公有制单位内就业比例为26.6%,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同样没有控制户口性质,办事人员中农业户口的比例却有较大提升,但公有制单位的比例却在下降,恰好反映出农业户口的“80后”青年可以在非公有制单位中获得与非农户口“80后”青年更为相近的工作机会。第三个阶层是个体工商户阶层,由于是以他们的单位性质来区分,所以其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为0,而农业户口的“80后”青年占较大比重。城市工人是限定了户口性质的“80后”职业群体,他们在公有制的单位内就业的比例为41.3%,同样,农民工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仅为8.4%,两者的受教育年限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说明公有制单位在招录过程中存在着户籍歧视,但这些歧视也可能被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所加剧。农民阶层是一个相对绝对化的阶层,他们在户口性质上都属于农业户口,在就业属性上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都将其视为属于公有制单位。

表1 “80后”职业群体的分布状况和基本特征

	频次	农业户口比例	公有制单位比例	受教育年限均值	受教育年限中位数
第一类	51	29.4%	29.4%	14.8	15
第二类	64	40.6%	26.6%	13.6	15
第三类	50	63.3%	0.0%	10.4	9
第四类	80	0.0%	41.3%	12.4	12
第五类	286	100.0%	8.4%	10.2	9
第六类	102	100.0%	99.0%	7.8	9

从不同职业群体的技术能力来看,以国家干部、企业主、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组合起来的“80后”第一类职业群体在技术能力上也具有足够的优势,证明前文所分析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本文划分的“80后”青年人群的阶层来看,户籍制度、企业性质、教育和技术能力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分布差异显著,因此,可以认为这种以职业为核心的“80后”青年划分方式有较好的区分度和代表性。

尽管以职业为核心的“80后”人群的分类方式能够从户口性质、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等方面区分出“80后”群体之间的差别,但这只能证明在工业化社会的假设之下,“80后”青年职业群体分类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割。至于分割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体现中国社会转变过程中,社会制度弱化、高等教育市场化、就业结构产业化的影响,还是由于社会制度对“80后”群体产生明显的职业区隔,还需要进一步地验证。故而本文还需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来验证“80后”青年究竟处于一

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还是“二代”现象所暗示的相对禁锢的社会分层体系。下面将从家庭背景和代际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和解答这一问题。

### 三、家庭背景与代际流动

高社会流动率的证据可以被用来论证,所研究的社会具有成就取向而非先赋取向的特征,个人根据他们的个人素质来收获他们的报偿,而不是以诸如继承的财富或者私人关系这样的“不公平”优势为基础获得报偿。社会流动包括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测量代内流动需要关注一个人多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变化,“80后”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先赋其代内流动所能够测度和体现出的变化有限,故而代际流动更容易体现出“80后”青年的社会流动状况。代际流动多指以父辈(上一代)与子辈(下一代)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其背后隐含的意义是不同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职业地位变化。对父辈的指标选择问题上,一般有几种不同的趋向:

一是选择父亲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二是选择父亲和母亲中地位较高的一方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三是选择父亲和母亲的均值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三种选择方案各有利弊,本文选择是以父亲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但由于两者之间的职业划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但可以满足观察流动结果的要求。

从表2中可以看到“80后”青年与父辈相比职业流动的显著特点包括:一是流动规模大;二是向上流动为主;三是结构性流动是主要动因,从流动形成的原因来看,可以断定其主要原因是社会

结构性的变迁,因为大部分“80后”其父辈都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显然这与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中人口就业和职业岗位的结构性的变化有关;四是职业流动具有一定的传递性。即便是在机会均等和市场化配置下,父辈职业与子辈职业之间也带有一定的传递性,从调查结果来看,能够明显体现传递性的是第四类、第六类职业,即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相对应的职业,由此来看,代际的传递性还主要体现在较低且较传统的职业阶层。

表2 代际之间职业的流动

父亲职业	子女职业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2.8	3.3	6.0	2.7	0.5	0.0
专业技术人员	10.6	6.7	2.0	2.7	0.0	2.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0	11.7	4.0	8.1	2.5	1.1
商业工作人员	14.9	6.7	20.0	9.5	5.4	2.1
服务业工作人员	0.0	3.3	0.0	10.8	2.5	0.0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9.8	28.3	46.0	21.6	66.2	85.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14.9	26.7	14.0	35.1	15.2	7.4
警察及军人	0.0	1.7	0.0	1.4	0.0	0.0
不便分类人员	17.0	11.7	8.0	8.1	7.8	2.1

职业地位变化是基于工业化社会中教育、收入和职业声望三位一体的假设,认为职业的变化包括了教育、收入和声望等诸多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以劳动力市场化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中,这种假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单一从职业地位变化来考察中国的代际流动,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要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和检验。本文针对“80后”青年与其父辈之间在职业分类流动之外,还考察了户口性质、文化程度、就业单位性质层级等方面的流动。

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分割就是依托户籍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实现的,在那个时代,人们能够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就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属于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现阶段,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尽管重要性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仍然代表着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分析户口性质的变化也能够看到中国社会最为明显的两个社会结构板块变化。从数据分析结果看,毫无疑问,从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是主要的流动方向,与前文结构性流动和向上流动为主是当前代际流动主要特征的分析结果一致(见表3)。

表3 代际之间户口性质的流动

自己性质	父亲的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1 699	70
非农业户口	322	1 126

从文化程度的变化来看,父亲文化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子女文化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占60.6%,父亲文化程度是高中/中专/职高的子女文化程度是高中/中专/职高的占33.8%,父亲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的子女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的占67.3%。从流动方向看,总体上是向上流动的,父亲文化程度居中的子女变化幅度更大一些,居于两端的流动性相对较弱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下,受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让自己的子女保持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低端文化程度人群改变自己的教育程度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教育可能成为中国社会流动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跨越式流动,而不是阶梯式流动;另一方面教育确实确实成为一个隐形的障碍,阻碍社会流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与之前分析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有关,初中以下人口收入较低,他们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相对较少(见表4)。

表4 代际之间文化程度的流动

本人文化程度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职高	大专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67.3	24.8	7.9
高中/中专/职高	21.4	33.8	31.5
大专及以上	11.3	41.4	60.6

从单位性质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绝大部分就业人口都在公有制单位,即便是农民也属于集体

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而调查中的问题是问被调查“80后”青年14岁时父亲的工作信息,根据“80后”的年龄推算,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因而其变化更为丰富。在分析中发现农民由于其特殊性会干扰到分析的结果,故排除了第六类职业的“80后”群体,从表5中可见,目前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80后”中有超过一半人的父亲在相应的公有制单位工作,而目前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80后”青年的父亲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不足1/4。这说明在城镇或者非农就业的“80后”中,企业性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

表5 代际之间工作单位的流动

父亲的就业单位	子女就业单位			
	包括农民		不包括农民	
	公有制单位	非公有制单位	公有制单位	非公有制单位
农村家庭经营	58.8	41.6	21.2	28.1
人民公社	0.0	1.1	0.0	1.2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1.2	0.7	0.9	0.6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0.0	5.2	25.8	9.0
国有/集体事业单位	6.5	6.3	15.2	10.2
集体企业	3.5	1.4	9.1	1.8
私营企业	7.1	11.2	9.1	12.6
个体工商户	4.1	14.3	6.1	16.2
民办非企业单位	0.0	0.4	0.0	0.6
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	0.6	1.1	0.9	1.2
其他	0.0	1.4	0.0	2.4
没有单位	1.8	5.6	1.5	4.8
不适用	6.5	8.0	9.1	9.0
不清楚	0.0	1.8	0.0	2.4

上述分析结果无疑证明,“80后”青年的社会流动规模和幅度较大,代际流动以向上流动为主,户口制度、教育水平和单位性质在“80后”青年的代际流动过程中带有一定的传承性,这一发现与前文对劳动力市场、教育和职业的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社会变化过程中,在社会制度弱化、高等教育市场化、就业结构产业化等因素作用下,以职业为基础的分类体系是科学且有效的社会分层结果。下面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种职业分类体系在测量“80后”青年其他社会地位指标上是否具有一定聚合性,即从社会分层的其他指标来验证与职业分类的一致性。只有验证职业分类与其他社会分层指标之间的一致性,才能确认“80后”的职业分类是一种可靠的社会分层方法。其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较为客观的收入、消费和生活方式;第二个方面是阶层认

同和社会态度等主观的社会分层指标。

#### 四、收入、消费和生活方式

在市场的调节和运作下,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流动,与企业组织或者单位双向选择,从而实现最优化的市场配置,即按照各自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从事不同职业岗位,不同职业岗位由于其在企业组织或者单位中的重要性或者关键作用不同,又被赋予不同的工资水平。通常而言,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特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分配到较高等级和特殊需求的职业岗位,而较高等级和特殊需求的职业岗位的收入要比一般职业岗位的收入要高。这就是在工业化背景下,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法,将带有不同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特质的劳动力与相应的工作岗位匹配,从而通过工作岗位

的重要程度的区别,来实现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合理差别。

在“80后”的各个职业群体中,前文分析也看到,不仅仅有个人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所以,从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来看,既存在着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比如管理者与工人,也存在着相似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比如城市工人和农民工(见表6)。

表6 分职业的收入状况

职业	收入均值	收入中位数	收入标准差
第一类	24 282.12	20 000.0	18 154
第二类	17 690.77	16 903.5	9 897
第三类	24 850.34	12 503.5	46 249
第四类	16 352.15	13 150.0	11 945
第五类	6 918.56	3 000.0	9 438
第六类	4 057.89	2 410.5	5 301

除了收入之外,消费也是反映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社会学通过消费来研究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消费水平,即消费的绝对数额,一般将消费水平视为收入水平的函数,即被收入水平所决定;二是消费结构,即消费品的构成,一般使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测量指标,将消费结构划分为温饱型、发展型等等。本文也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80后”职业群体的消费特征。

从消费水平上来看,前四类“80后”青年职业群体的消费年平均值都非常接近,其原因在每个职业群体中都有一些超高消费的奇异值出现,上述每组人群的消费的标准差也非常大。因此,与平均值相比,消费的中位数更能代表实际的消费水平。从消费的中位数来看,人们的消费水平差异体现比较明显,第一类职业群体的消费中位数超过35 000元,办事人员为30 000元,个体工商户为25 600元,城市工人与个体工商户水平基本相当,农民工的消费中位数略低一些,为22 900

元,农民群体消费水平最低,消费中位数仅为11 280元。“80后”消费水平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消费均值普遍高于消费中位数,其超出的程度也高于收入的差异。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其原因是有部分奇异值导致的偏倚,从社会现实状况来看是有一些“80后”存在超常消费的状况。比如“80后”群体买房、买车和结婚的重要消费品购买和重大人生事件上的消费数额是非常大的,远远超出了“80后”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所以需要父母给予子女经济上的支持。加之,“80后”群体中相当部分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些(见表7)。

还可以看到,在消费均值较为接近的情况下,消费均值与消费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在层次越高的群体中差异越小,其中原因在于“80后”的消费水准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比如买房、买车等消费较为普遍,超常消费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而层次越高的“80后”群体收入水平较高,消费中位数更能代表实际消费能力。消费均值与消费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代表了在相似的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能力之间的差异,而弥补这一差异更多可能是来自“啃老”的结果。

此外,从测量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办事人员的恩格尔系数是最高的,为0.36;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最低,为0.28。这一结果与一般规律性不同,在“80后”群体中可能合理地解释是办事人员处于相应的中下阶层,在收入水平与中上阶层有一定差异的情况下,消费上在追随或者追赶中上阶层的生活水准,同样的基础消费品的支出占办事人员群体总收入的比重显然要大于在中上职业群体中的比重。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中下阶层过度消费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追随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方式。故此,在一个变化较为激烈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恩格尔系数可能无法代表人们消费背后的含义,这点在“80后”群体中体现得较为明显。通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80后”青年职业群体的消费中可以看到,消费均值所代表的共性和恩格尔系数失真的情况。

表7 分职业的消费状况

职业	消费均值	消费中位数	消费标准差	恩格尔系数
第一类	45 620	35 300	44 564	0.31
第二类	44 595	30 000	46 997	0.36
第三类	42 179	25 600	65 783	0.33
第四类	50 370	26 250	79 647	0.34
第五类	30 034	22 900	26 696	0.31
第六类	16 765	11 280	23 148	0.28

## 五、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

“80后”职业群体收入和消费上差异较为明显,可以视为客观上的分化结果,而主观上的分化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测度:主观的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主观阶层认同一般被认为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层级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和认同。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阶层认同等同于阶级认同,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由个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而且,阶级认同的产生是阶级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阶级认同就没有阶级的存在。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则不同,他在阶级概念之外,寻找到另外一个标注个体在社会中位置的指标——地位。一个人的地位与声望相联系,地位群体通常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相同收入或者相同经济地位的人可能相互之间并不认同,故此,他由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阶层认同的观点过于简单了,只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共同价值准则才是阶层共同意识形成的基础。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阶层意识作为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的反应,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状况相关的;另一方面,阶层意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构成下的阶层意识可能大相径庭。本文则主要观察的是在前文对“80后”职业群体收入、消费和生活方式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他们阶层认同的差异,检查是否具有聚合性和一致性。

从“80后”职业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自评来看,第一类职业群体认为自己是上和中上阶层的

比例最高,两者合计为17.7%,他们很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下层,只有3.9%的人这样认为,而其他群体中认为自己处于下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上,最高的是城市工人,有23.8%认为自己属于下层,这一比例甚至高于“80后”农民(见表8)。现实中,工人群体、尤其是城市工人,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受到劳动力市场化冲击最为严重的职业群体,他们的铁饭碗被打破,再就业难度较大。但令人意外的是“80后”城市工人,他们在本身并没有经历过下岗失业的冲击情况下也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比例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多属于第一类职业群体或者办事人员有关。同理,“80后”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比例并不高,可能与他们的参照群体可能是比他们更低的农民群体有关,他们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及以上的比例也远远高于“80后”的城市工人。

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是两个分歧比较大的职业群体,一边是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中上的比例较高,另一边是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比例也不低。在工业国家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群体比较接近中低中产阶级和自营劳动者阶层,他们本身就是属于定位相对较为模糊的阶层群体,他们一方面工作性质更为接近中上阶层,也很有可能通过努力工作或者成功经营晋升为中上阶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组织、资本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自身地位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也可能沦落到社会的下层。“80后”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的情况也较为近似,他们既有上升的台阶,也有往下沉沦的可能。

表8 “80后”职业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自评

经济社会地位自评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上	2.0	0.0	0.0	1.3	1.1	0.0
中上	15.7	12.5	14.0	7.5	5.9	7.8
中	35.3	39.1	44.0	28.8	45.5	44.1
中下	41.2	32.8	22.0	38.8	27.3	26.5
下	3.9	12.5	20.0	23.8	14.3	19.6
不好说	2.0	3.1	0.0	0.0	5.9	2.0

整体上看,“80后”职业群体的阶层意识与自身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是较为一致的,“80后”城市工人虽然没有下岗、失业等老一代城市工人的境遇,但与改革开放前工人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相比,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会更强烈,其参照群体更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阶层,所以他们的经济社会自评反而是最低的。所以,在“80后”职业群体的阶层意识中,既能够看到与经

济收入相关的一面,也能够看到相对独立的一面。

除了阶层意识之外,“80后”的社会态度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长期以来,“80后”被视为在温室里长大的娇生惯养的孩子们,个性张扬、强调自我、缺乏责任感等等,但在近年来,特别是“80后”从孩童成长为青年之后,承担了生活中各种压力和责任,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人们还被“80后”在现实和网络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关

怀和批判意识所震惊,他们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对中国社会与现实的忧患意识。“80后”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态度将左右中国的未来。本文对社会态度的分析主要选择社会公平态度。对公平方面的测量包括三道题目:(1)机会是否均等,如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与其他人的子女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2)结果是否公平,如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3)是否应该有一个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平过程,如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

从调查结果来看,“80后”职业群体整体上还是倾向于认同机会均等的,毕竟中国市场化改革

已经基本实现。其中“80后”的城市工人最倾向于认为机会不均等,有16.3%选择“很不同意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与其他人的子女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而选择这一比例最低的是“80后”办事人员和“80后”农民工,分别有6.3%和7.0%选择很不同意。“80后”农民也有11.8%的选择很不同意这一观点,但选择很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有24.5%的人选择,明显要高于其他群体。这一结果说明,“80后”城市工人是最为明显的被剥夺机会的人群,而“80后”农民虽然也被剥夺了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多新的机会产生,比如对进城经商务工限制的放松(见表9)。

表9 对机会均等的社会态度

对机会均等的看法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很不同意	9.8	6.3	12.0	16.3	7.0	11.8
不大同意	23.5	28.1	26.0	20.0	28.0	19.6
比较同意	52.9	48.4	44.0	46.3	42.7	38.2
很同意	13.7	17.2	18.0	16.3	17.8	24.5
不清楚	0.0	0.0	0.0	1.3	4.6	5.9

在西方社会中把机会均等看得最为重要,如果在一个真正意义制度上或者环节上能够实现机会均等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由于其他原因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则更可能地被合理解释掉,比如人力资本的差异造成在劳动力市场中重要性的不同,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但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中,则很难实现结果的平等。

从调查结果来看,第一类职业群体最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是结果不公平的,分别有15.7%和33.3%选择了“很不同意”和“不大同意”;而个体工商户则是最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是结果公平的,分别有12.0%和56.0%选择“很同意”和“比较同意”(见表10)。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分析这两者,会非常有意思,一方面第一类职业群体是在

劳动力市场上占有优势的,他们最有可能在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且他们本身是依靠自身的优势来取得更多的收入,却认为这一结果不公平的。反过来看个体工商户,他们恰恰在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内工作,却认为这一结果是公平的。

当然,我们现在没法检验这一结果与是否在市场领域内就业有无关系,唯一可能的推测就是在市场化领域内就业的“80后”职业群体更倾向于认同市场化竞争规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化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而在非劳动力市场化领域内就业的人则不认同现在人们的状况是市场化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还是存在其他不公平因素。

表10 对结果均等的社会态度

对结果均等的看法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很不同意	15.7	14.1	12.0	15.0	7.0	11.8
不大同意	33.3	29.7	20.0	26.3	31.5	29.4
比较同意	31.4	37.5	56.0	42.5	45.5	36.3
很同意	19.6	18.8	12.0	13.8	14.0	17.7
不清楚	0.0	0.0	0.0	2.5	2.1	4.9

在实现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形成一个过程,能够让

所有人获得同等机会,税收在其中扮演着矫正机会公平的角色。对于“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

多的税来帮助穷人”的看法,人们的看法总体上是压倒性的,每个“80后”职业群体中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很同意”和“比较同意”。第一类职业群体、办事人员和城市工人的态度是相对积极一些,分别有35.3%、34.4%和32.5%的人

选择“很同意”。可能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更高有关,因为通过税收形成的社会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机制还不是一个直接影响因素,而是相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设计(见表11)。

表 11 对过程公平的社会态度

对过程公平的看法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很不同意	0.0	4.7	6.0	2.5	4.6	3.9
不大同意	23.5	15.6	10.0	26.3	21.3	22.6
比较同意	39.2	45.3	56.0	38.8	42.3	33.3
很同意	35.3	34.4	24.0	32.5	28.3	33.3
不清楚	2.0	0.0	4.0	0.0	3.5	6.9

“80后”职业群体在阶层自我认同上表现出在较高阶层出现下偏,在较低阶层出现上偏趋势。在公平感的社会态度方面,对机会公平的认同程度较高一些,但对结果公平的分歧较大,可能与他们自身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有关系,而普遍认为需要的是过程公平,即通过向有钱人多征税,补贴穷人,以此来纠正机会的不公平状况。总体上看“80后”职业群体的阶层意识和社会态度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一致的。

## 六、结 语

“80后”青年的成长历程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基本同步,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的影子。“80后”青年所处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代,同时也是人们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越来越突出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能够看到中国社会逐渐随着劳动力市场日渐成熟,旧有的社会制度控制力减弱,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还能够看到“富二代”、“官二代”这样具有典型封建社会影子的称谓。本文针对“80后”青年人群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就高等教育、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讨论了其所处社会变化过程,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开放,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适用于“80后”青年,并在充分考虑户籍制度、企业性质、高等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下,将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上层合并,形成一个特殊的第一类职业群体。其他“80后”群体按照职业标准划分为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等五个阶层。其中办事人员是最接近于处于中上层“80后”的职业群体。个体工商户和城市工人都被视为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职业群体。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代际流动的角度加以佐证中国的变化,研究从“80后”与其父辈的比较出发,认为“80后”代际流动的特点包括:社会流动规模大,以向上流动为主,职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性流动是社会流动性强的很重要原因。同时,职业流动在代际之间也具有一定的传递性。而从教育水平、户口属性和单位性质方面的分析也证明中国带有社会流动剧烈等特征。“80后”青年的职业划分是一个区分和衡量“80后”青年比较有效的指标,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消费、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之间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本文对中国“80后”群体所处的时代已经接近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力配给方式。当然“80后”青年也或多或少沿袭了一些计划经济的影子,比如在划分工人群体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产业,而是按照户籍来划分,数据分析证明这些划分都能够凸显出两个群体的不同之处。

接下来讨论的是“80后”职业群体划分与其他社会分层指标之间的一致性,即这种划分方式能否有效将不同职业人群在收入、消费、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方面区分开来。

“80后”青年的收入水平与职业层级基本相符,职业层级越高,其收入也越高。唯一例外的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他们虽然职业层级低于办事人员,但是收入水平上并不低,甚至收入的平均值是最高的,其原因在于有小部分的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偏倚。城市工人的收入要高于农民工,农民的收入是最低的。

从消费来看,“80后”青年群体即呈现出差异性,又在局部体现出趋同性。总体上看,各个职业群体之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显著区别。从消费水平的平均数来看,各个职业群体之

间又非常接近,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较为接近的优势人群、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城市工人群体中都存在着少量的大额偏倚消费的存在。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可以看到如果在城市生活的话,每个“80后”青年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在每个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上都是相似的,这也是他们在消费均值上出现趋同性的重要原因。

“80后”青年的阶层认同在不同层级的职业群体中有不同的趋势。在较高的职业层级中,比如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农民工则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阶层意识作为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的反应,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状况相关的;另一方面,阶层意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存在,比如“80后”城市工人对自己的评价是最低的,而他们的经济状况显然要好于农民工和农民。“80后”青年在公平感的社会态度方面,对机会公平的认同程度较高一些,但对结果公平的分歧较大,可能与他们自身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有关系,而普遍认为需要的是过程公平,即通过向有钱人多征税,补贴穷人,以此来纠正机会的不公平状况。

综上所述,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结构性变迁,但从“80后”人群中仍然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影响很大,社会变迁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高社会流动率阶段,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当然,掌握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本的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家庭的优势来照顾下一代子女,但与其他代际或者人群相比,“80后”群体是第一代鲜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总体性划分印记的社会人群,从他们成长环境和过程来看,经济社会地位的决定逻辑或者是社会分层的基础越来越向工业化社会靠拢,自致因素的作用更为普遍,大规模的、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印证了社会的开放

性,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能够清楚、可靠地验证“80后”青年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层次性。

#### 参考文献:

- [1] Erikson, Goldthorpe. The CASMIN project and the American dream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8): 283 - 305.
- [2] Peter M. Blau,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 New York: Wiley, 1967: 89 - 108.
- [3] K. M. MacDonald. Social closure and occupational registration [J]. *Sociology*, 1985 (19): 541 - 556.
- [4] Kim A. Weeden. Why Do Some Occupations Pay More than Others? Social Clos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2, 108: 55 - 101.
- [5] 边燕杰, 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1).
- [6]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J]. *经济研究* 2001 (6).
- [7] 李建民. 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
- [8] 钟笑寒.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 [9] 李实, 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6).
- [10] Ivan Szelenyi, Eric Kostello.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 1082 - 1096.
- [11]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J]. *社会学研究* 2010, (3).
- [12] 杨舸, 王广州. 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兼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一文商榷 [J]. *社会学研究* 2011 (3).

[责任编辑: 杨大威]